

翻译批评论

FANYI PIPINGLUN

姜治文 文 军 编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批评论:英汉对照/姜治文,文军编著.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9. 8
ISBN 7-5624-1913-2

I. 翻… II. ①姜… ②文… III. 翻译-批评-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7798 号

翻 译 批 评 论

姜治文 文 军 编著

责任编辑 黄世芳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电力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25 字数:649 千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5624-1913-2/H·159 定价: 平装:26.00 元
精装:35.00 元

第一部分 理论篇

第一章 翻译批评概论

第一节 翻译批评各家谈

一、论翻译批评

自从《翻译通报》推动了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来,在建立一个翻译界与出版界的新道德上,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为了把这一运动普遍地展开,并且从而提高一步而又不流于偏向,翻译界目前有马上开始摸索,以期建立一个翻译方法和批评方法的理论体系之必要。这种理论,我们以前不曾有过,严复的“信、达、雅”远不够作为我们的指南,鲁迅先生的“直译”精神也有待于更详尽的注解,国外的某些理论,标准太高,又不能完全适用于今日我国翻译界普遍的情况;这个问题,个人想另在论翻译方法上去提供意见;这里只谈批评。批评的标准,本来是很难定的,尤其我们丝毫没有可以依据的东西,所以必须逐步地建立起来。给翻译批评指出一个原则性的方向,决不是主观地订立一个衡之事实过高或过低的标准,而是要在今天中国翻译界的一般水平上,从一般严肃的翻译工作者的集体经验中,归纳出一个切乎现阶段实际情况的标准,本扩大翻译工作影响的目的,作为从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翻译界现阶段水平的指南。这个标准,第一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建立起来的,第二不是永远不变的——它在翻译工作发展到一定的新的水平后,反过来会修正这个标准,充实它的理论基础,把它的条件更推进一步。

在目前,每一个翻译工作者尽量提供个人的经验,工作中存在着的问题,和对于翻译方法和批评标准的意见——哪怕是片段的,都会有助于批评标准或理论体系的建立。每经过一定的过程和一定的时间,这些经验,问题和意见,便通过像《翻译通报》这样的机构,被作成原则性的总结:这种总结便是翻译批评理论的初步基础。

近来许多有关的刊物和报纸上,都时常出现批评翻译的文章,翻译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已经开始展开,这是好的,也是必须继续下去的。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现象:比较好的译本及译者,受到了批评,而比较差的译文和译者反倒无人(或者不暇)过问。这可能影响比较好的翻译工作者的情绪;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读者可能因此而误把没有受到批评的较差的译文,认为比受到了批评的较好译文为更可信赖——这是对于我们人民的文化事业,有严重的影响的。

批评漫无标准,个人各以主观的尺度去衡量译文——这是产生这种隐藏着不良倾向的批评现状的主因。有人认为及时地表扬些较好的译文是一种补救的方法,不错,是方法之一种,但不能解决全面的问题。为求得一个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将建议在批评与表扬的同时,开始展开讨论怎样更具体地建立起一个翻译批评的共同纲领。这里我先发表我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1. 必须估计那些客观条件

任何一位翻译批评者,在批评任何一种译文之前,要把将被批评的译文是在什么条件之下完成的,和自己将要动笔的那篇批评可能产生怎样的群众性的效果,事先好好考虑一下。据个人所能想得到的,我们必须把下列三种客观条件,作为我们写批评文字的出发点:

第一是人力。今天,全国从事于翻译工作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兼业,而且是业余性质的(amateurish)兼业。根据《翻译通报》第五期的初步调查统计,919个翻译工作同志中,只有44个人是以翻译为专业的。而且,这44个人当中,我相信,还有若干人的工作是专门为某一机构内部做的,换言之,他的译文,坊间并不能读到。在这种情形下看来,事实上也是,一般的翻译工作者是很忙,工作都很紧张;在这样忙碌、疲乏和有限的时间的条件下,还有这么多的人为了迎接文化高潮而努力介绍国外进步的文化,特别是苏联的文化,这情况基本上是值得重视的。因此,我们在批评任何一种译文的时候,必须记住这些译文绝大部分都是在译者繁重的本位工作以外的加工,而且,有的时候,甚至是在疲乏到眼花缭乱,连字都看不清楚的情形下完成的,如《通报》第四期王汶同志的《翻译经验谈》里所讲的情形,据个人所知道的,有许多人都

是如此。

有些译文里边的错误，是从过度的工作中产生的，这并不证明译者的不负责或能力缺乏。我个人就有过无数这类的经验。固然我的能力不强，但我自信还肯负责，而且对于一些最平常的字句，也不会能力低到那种程度；然而，常常因为极度的疲乏会弄出错误来，如同我曾经把 Cab 译成 Cap，把 thirsty 译成 thirty；有的时候，因为过分考虑一个字，注意力太集中了，便脱落了另外的一个字，比如，在一篇小说里，我在研究“the hot bunk”里的 bunk 应该译做“寝台”好，还是“架床”好，等到下笔的时候便把 hot 这个字整个给漏掉了。又有一次，译德文，在子句里，有些德文动词是要拆开而把前半个字放在子句的最后尾的，我因为太注意那一全句怎样译法更能传神了，结果便把 aufmachen（打开，解开……）这个字（前半的 auf 放在句子最后）忘掉了前半截而译成了 machen（做，取……）。更有的时候，因为不能用全部时间来扒桌子、译书往往是争取时间的，稍有空闲就坐下去译几段甚至几句，所以竟会把理应和上下句文理口气相连的最平易的句子译错，如在我译的《草原的太阳》里，原文“and some agitator”（而且成了个宣传鼓动员），我竟译成了“而且某个宣传鼓动员”……我举这些例子，并非为自己洗刷，意在指出根据自己的经验，确实知道现阶段翻译工作者的辛苦。因此，我很替像这样辛苦地工作而招致了无情地批评的忠诚负责的翻译界同志们难过。我愿意说一句公道话：一本书里个把句子个把字的误译是该提醒的，但是不必作为为了不得的缺点来提出的。

另外还有些实际情况，也是应该估计的。我们的排版术因为字体的限制，还停留在小手工业的方式上。手工是常常出错的，所以排出字来，虽经再三校对，也还会有错，而特别靠不住的校对人便是著者和译者他本人（这大概每个作家和译者都有如此的经验）。把字句排错到不可理解的程度，读者还容易辨识，有时候字句排错而恰恰令人读得通顺，也是常见的。如个人所译的东西里，就有一个地方，把“禁猎场”（preserve）排掉一个“禁”字。这种是令人哭笑不得的。可是，译者本人已在哭笑不得了，我们倘再像煞有介事地指责他为外文程度不够或者不够负责，那便有失公道了。

其二是语言。假定专找小毛病，而不从译文的大处着眼，虽像大家公认为最优良的译本如《联共（布）党史》者，也不免有错。我们今天不可能一下子冒出一对 Maude 夫妇来，将来恐怕也不容易，而且一对 Maude 也不能解决群众性工作上的问题。我们现在遭遇的主要困难之一，是中外语言体系之迥不相同。同时，不可否认地，目前尚不能十足代表中国人民大众语言的中国文字，有它一定的贫乏性。这两种限制，使翻译工作成为极其艰苦的工作；译者

要忠实地传达原著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可是语文的体系不同和它的贫乏性，迫使译者除去“再创作”（翻译是一个“二度创作”工作，这将留到下次另题详谈）以外，还要去创造句法和词汇（自然是根据人民大众的语言），以丰富我们的文字。中外语文体系之不同，给中文译者添了许多苦恼，比如说，我想大家认为最麻烦的，莫若包括子句或称副句的复句问题。有些人认为遇到包括子句的复句，可以拆成数句或从后倒转来翻译，固然，这是办法之一，但，也不能永远解决问题，比如这一句：

His mind shrank from the thought of the stuffy cabins the hot bunk, the nurse asleep under the glaring lamplight which threw into bold relief the white kerchief, the bloodred cross on the smock, the parchment face of the dreary companion of suffering.

随便你怎样拆，怎样颠倒，也是很难把原文的精神和重心传达得恰如其分的。有人屡次强调说：只要看懂了外文，便能译成好的中文，又说外文里的一切表达方法，中文里全有，只要中文有修养便可胜任；这话是不太可信赖的。有的时候，译者确是懂了原文，他的中文确也相当有根底，而他竟找不出适当的句子来给他使用（自然他可以找些古老生涩的或者文言的句子来用；但这违反翻译为了大众的目的，是我们反对的）。此外，最简单的像单个的字，就有许许多多没有法子译好，随便举出几个临时想到的字吧，如英文中的 *whisper loudly*, *murmur*, *mutter*, *snort*, *vasistas*... 有几乎数不清的单字，都有待于我们慢慢向人民中间去学习恰当的词汇，才能翻译得恰当。

因此，翻译工作者因为中国文字的限制而遭受的困难，也不算小。到目前为止，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艺，全部现有的中文译本中，倘说哪一本里边完全没有一个错误和一点有待斟酌之处，是不切实际的——这并不证明所有翻译工作者中连一个中外文修养都及格的人没有，相反地，绝大部分的翻译工作者，能力都是胜任愉快的，问题是，有不小的一部分困难在于语言文字。当我们写批评文章的时候，这一个因素，必须估计在内，而“不是指责译者的能力而是讨论如何丰富语文”，应当是批评的重心。

最后，而最重要的是影响。“我们要首先估计某一译文对于新中国文化的影响。倘若一种译文，在人民的思想上知识上，起了一定的提高作用，虽然它里边有若干可以商讨的地方，也该表扬重于批判。不去重视影响的问题，而只枝枝节节地评论某一句某一字，那是“舍本求末”；不但如此，这种批评文字，也会无意地妨碍了新中国文化的发展。像《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的批评，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目前不可能把所有政治经典和政治学习的译文，一一加以批评，而突然毫无原则地接二连三地批评了其中单独某一本最好之

一的译者和最好之一的而且是最有好的影响之一的译文,这将使读者认为这一本较好的译文是最要不得的——这等于无意地帮助了较坏的译文。比如说,一种外文著作同时有两种译文,甲译的影响(及可能因表扬而发生的影响)最好,但里边有十个错,乙译里只有五个错,但原著的正确性和精神完全失去。那,我们将毫无疑问地表扬这十个错的甲译,认为它是较近于定本。换句话说,译文的好坏,完全不应以个别的错误(错误产生于上述两个原因的)之多少为衡准(自然,满篇是错、句句有错的译文,不在话题之内),而应以它是否正确地传达了原意,又正确地使读者了解了原意为尺度。文艺作品更应视其是否尽量保持并传达了原作的主题与风格为条件。

目前的翻译批评,在各刊物报纸上所见到的,几乎全是枝枝节节的“挑错儿”,而没有去强调译文在读者中间所发生的与所可能发生的影响。而“挑错儿”是何等容易的事呢?随便翻开一本书,坐在那里,只用一小时,便可以以任何一厚本译文里“挑”出若干“错儿”来。但是,我们的批评目的绝对不在这里,我们的目的是要扩大翻译的影响——良好的影响。批评者如果不从这里出发,他本身便犯了严重的错误!

2. 必须分辨那一类的译文

在我们进行批评的时候,不能用一种准则去衡量所有不同学科的译文。自然科学的译文,主要地是要看它所介绍的科学本身的正确性,我们不必管它是直译,是意译,更不必斤斤于一字一句的顺序和增减,只要它把那一种科学的本身,传达得毫无遗漏,便算是忠实,传达得清楚明白,便算是佳译。社会科学则应注意意识和方法论上有无歪曲,译者的政治思想水平有无问题(《通报》第五期有几篇文章是很重要的,今后似应多多提倡这一类的批评),和传达上有无因错误而歪曲了思想的地方。比如《从猿到人》的译文,“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最粗笨的石刀”也好,“任何猿类的手,是连最简陋的石刀也没有制造出来过的”也好,总之这不是文艺,所以就很不必去推敲这些字句,两种译法都没有叫猿手造出石刀来,思想与科学的事实没有歪曲,似乎可以“放行”一步的。至于文艺作品,那就不同了,每个字每一句都应该推敲,尤其应当注意译文的风格,是否是在尽量保持和传达原著的作风。我们有少数的译者,往往把古今的外国作品,一律译成他自己的调调儿,尤其主题严肃,思想进步的作品,往往经由这类作家的“调调儿”一卖弄,就完全变为滑稽,完全把主题歪曲。所以,我们的批评家对于文艺作品的风格(原作的风格)是应当十二分注意的,而批评的重心,目前也应该放在这里。

以批评文艺译文的尺度去批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正如以批评自然科

学与社会科学的尺度去批评文艺,是同样不正确的。

3. 那些要公开批评,那一类不必

根据上述的意见,现阶段批评的最大目的,既是扩大翻译的良好影响,那么,完成这个目的的手段,当然就不仅限于一种。同时,既然也正如前所述,枝枝节节地批评,可能有引起读者错觉的危险,那,我们就应当辨明哪些该公开批评,哪些可以寻求另外也能完成目的的途径。

哪一些译文要公开批评呢?第一是译者政治修养不够,无意中歪曲了正确的思想。这不但是对译者一种教育,而且是对读者群众的教育。其次是大体上歪曲了原著正确意识和中心思想及作风(文艺)的。第三是任意删漏增添而无补益于(并且伤害了)原意的,和译文所传达的意思前后不符的。第四,应该是语言问题。要尽量批评使我们广大的读者无法懂得的译文。反对用文言,反对用文言的词汇,反对用人民大众看不懂的字句;我们需要口语,需要大众语。但,在口语中我们也反对过多的运用局限于一个地区的土语(那也同样不能被广大的读者群众所了解),尤其反对闭门造车,译者以意为之的口语。

至于个别字句的斟酌,如“so... that”,是应该译为“如此……以致于……”好呢,还是“太……结果……”好呢,再如把“dark”一字译作“黑”好呢,还译作是“昏黑”好呢,那只是末节,并不妨害全书的价值。同时,我们也要体谅现阶段的翻译工作者的困难条件,善意地原谅他的笔误、校对错误等等。但,这些错误是否不该指出呢?绝对应该!我建议,遇到这种错误,批评者将以建议性的意见,送交译者,或送出版家转交或经由《翻译通报》转交,由译者直接向批评者作答复或讨论,然后,在译文再版的时候,由译者和出版家保证改正。倘若经过这种做法,译者置之不答复,或者再版时不去改正,那便涉及态度和文化道德的问题了,批评者是有权公开予以批评的。

这样的做法,我想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同时,也可以避免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流弊。不知道全国的翻译界与出版界以为如何?

至于哪些错误是属于批评者与受批评者直接商讨的范围的问题,是很简单的。当批评者校订一种译文时,不到一页,他马上就可以看出译者的能力;当发现译者把原文许多难译的地方都能处理得很好,而独独在某些较容易的地方出了毛病时,则这些毛病,一定是出于匆忙、疏忽、精神不济,或者其他种种客观的原因了,那么,这些毛病,便属于这一范围了。

4. 用那种态度来批评

到目前为止,全国翻译批评者的态度,都是良好的、善意的、恳切的,这一

点我们必须强调指出。我这里所要说的态度,是说,我们对于老牌翻译者和新进后起的工作者,应该有所区别。对于在翻译上有几十年的贡献而确是令人可学习的老辈翻译工作者,我们应当去发扬他的好的范例;其问题多一些的老辈译者,则应以团结的方法去批评,去争取。对于新进的译者和新手,我们应当去鼓励,去指导,其中杰出的应当特别予以表扬。我们切不可举出一大堆苛刻的条件,比如说,“要从事翻译,非先读外文在十年以上不必妄想”,“要翻译文艺作品,非得上通天文下识地理不可”,这样的条件一摆出,对于新进译者和后来的人,等于当头一棒,一棒便可能打退多少将来可能比我们这一代更优良的翻译人材。

最后,我再重复一句:在现阶段上,翻译批评,必须首先估计被批评的译文及译者的已有的及将来可能有的群众性的影响,同时,也必须估计到批评本身的所可能产生的同样的影响。

——本节(一)选自《翻译通报》

二、试论翻译批评

翻译批评作为一种实践,伴随翻译而生,有著自身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所谓必然,是因为有了翻译,就必然会有对翻译的阅读,会有人试图对涉及翻译的种种现象和因素作出评价;所谓必要,是因为具有理论意识的翻译批评,势必追求翻译批评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试图通过翻译批评影响翻译,引导翻译实践往健康的方向发展。然而,近年来的翻译批评实践与理论现状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也许过分重视了翻译批评的必然性而忽视了一必要的一面。翻译批评的尴尬处境似乎是批评者自己造成的:一方面,批评理所当然地赋予自己评点江山的使命,颐指气使地指责译本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另一方面,它们却几乎对译者影响不大,无法达到有利于提高翻译质量的目的,更遑论有助于翻译理论自身的建设。面对翻译批评这一具有“自发和随意性”,却难以有“自主、规范和指导性”的状况,本文拟就翻译批评,特别是文学翻译批评的实践与理论作深层次的思考,对翻译批评理论迫切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1. 翻译批评的现状

近些年来,翻译在各国文化生活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加,于是对翻译中出现的种种现象的讨论也随之日益活跃。与翻译有关的文章开始频频见诸报

纸杂志。其中自然也少不了对译作的评价——这就是大多数人所理解的翻译批评的含义了。但是表面的繁荣往往掩藏着一定的危机,仔细分析一下,大致有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是随意性。时下的翻译批评仍然大多是“感悟性”的,一册译文在手,不及细读与比较,便凭自己的主观印象子丑寅卯评论一番。正如国内早就有人指出来的那样,这一类的批评往往“显得比较空泛,总是游离于批评客体的表层与外围,结论也往往只限于‘感想式的’,主观性较强”(许钧,1992:38)。换句话说,这一类的批评缺乏的是大家(翻译家和翻译作品的读者)所认可的统一的游戏规则,因此不能触及批评对象的实质:好,好在哪里;不好,又是不好在哪里?翻译批评与文学创作的批评毕竟有所不同:它不仅需要分析译家是如何进行再创作的,更要把译作放入历史的流程,指出译家在其间进行再创作的合理及不合理的一面,并据此考察在现有的翻译历史阶段,暂时的、但具有指导意义的规则是什么。单从形式上来说,中国艺术批评历来所采取的那种“点悟”或“机心”性的批评形式不是决然不可以用于翻译批评,尤其是对翻译中的某一个具体问题或现象进行分析的时候。但是更为重要的,也是时下这种感悟性批评真正匮乏的,是一定的理论基础与前后贯通的体系。

其次是浅表性。我们不难发现,在随想式的说好说坏之外,现在于翻译上最易见到的,还有一类批评:那便是“对照原文与译文,挑出其中的错误”。而有趣的是,这类错误往往只限于理解的层面,在批评者来看,无非是译家的认知或语言功力出了问题(有时甚至是疏忽)。诚然,翻译批评就其社会意义上来说,必须对不够严肃认真的译家提出质疑,但这毕竟不是它的主要目的。而解决个别译家的语言认知空缺(请注意,作为个体的理解行为,偏差的偶然出现当然在所难免),也不能从本质上把握翻译。满足于语义层面的校正于是使翻译批评沦为比较语言学的课本,就认识根源而言,无非是将翻译看作一种“第二位”的活动,机械地认为只要译文与原文有所出入,就是错误。其实较之静态的翻译结果,翻译批评更应关注翻译的过程,因为翻译绝对不是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过程,在原作(出发语的语言文化、原作者)一译者(阅读者与再创作者的双重身分)一译作(目的语的语言文化)一译作读者(接受心理、审美层次等)这样一个相互影响的大系统中,翻译在每一步的制约中都取得一定的结果。

浅表性也就必然带来了翻译批评的片面性:即缺乏宏观的视野和微观的剖析相结合的批评方法。和任何一种批评一样,翻译批评也应当站在一定的高度审视翻译,不仅要考虑在上述这个大系统里影响翻译的各种因素,更要

从翻译在文化移植中的功能来评价翻译。在这个总体的把握之下,我们才能(当然也必须)涉及微观的语义传递乃至形象再现这类分类性的评价。小到一句话,甚至一个词的处理,译家的选择往往有其“机心”。然而我们大多数的批评家却忽视了这一点最基本的批评常识,仅从语言的角度去下“对”与“不对”的定论。例如前几年有位译家,发现傅雷的译文中常有一些小“错误”,与原文对不上号,便以此为证,认为傅雷的译文不够准确,却全不理睬傅雷译文的整体追求。真正的翻译批评应当把译作当成真正的作品来看:试想一下,对于单纯的文学创作,我们为什么不会因为作者偶一用词的失误或不到味(甚至是大段的败笔)来否定他们的创作呢?译作也有自己的结构、气韵,论到与原作的“等值”,这才是最重要的比照对象;当然,所谓的结构、气韵仍然是反映在译者在词汇、句式等这些具体而微的选择上的。

最后,归总到翻译批评的目的而言,我们不难发现眼下大多数翻译批评没有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所在:亦即翻译批评的盲目性。除却那类受人之托、为批评而批评的“应景性”批评文章不谈,我们看到,一方面,大多数的翻译批评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作为“批评的批评”,从事翻译批评的人必须对翻译本身,对它的实质、可行性、原则、方法、目的、功能、作用等基本问题有一个系统的认识。正如法国的翻译批评家贝尔曼(Berman, 1995)所指出的那样,翻译批评家应当同时是一个“译者、译文阅读者、译文分析家、翻译理论家与翻译史家”;而另一方面,一些包含一定理论思考的翻译批评又有著理论在先的价值倾向,即现成的理论体系去评价翻译,忽略了从翻译过程本身出发,最终再回到翻译结果自身的指导,从而造成了另一种机械性,同样不能完成翻译批评的历史使命。正是这一切造成了目前的批评更重“否定”的现状,“坊间看到的译评多是扬‘恶’隐‘善’的:译者犯的错误,给一一挑出来严加批评(而多数的译作,实在也不太争气);译者的成就,却反而轻轻带过,不予重视”(金圣华, 1995, 66)。

2. 批评理论的探索

科学意义上的翻译批评,它应当是一种特殊的“推销结构”,也就是说,它应当是在一定理论(有关语言、文本分析及翻译的理论)指导之下,历史地、客观地、系统地去观照翻译过程与翻译结果,乃至最后可以反过来观照翻译理论,促使翻译实践,包括翻译理论在内,能够与翻译历史的规律所指同向发展。

然而在我们分析翻译批评现状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随着翻译理论的系统发展,也有不少翻译理论家、批评家确实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不容

忽略的理论尝试。早在17世纪,梅齐利亚克(Claude-Gaspard Bachet, Sieur de Meziriac)就选择了翻译作为他进入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主题。在这篇《论翻译》中,梅齐利亚克以法国“不忠美人”的著名代表阿米欧所译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为对象,对该译本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第一次用逻辑的方法列出阿米欧不忠实于原文的地方,对阿米欧的增、删、改等做法逐一进行了分析,最后着重分析阿米欧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梅齐利亚克指出,翻译具有教育和滋养的功能。丰富法语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能用法语与古代的作家,特别是希腊的作家对话。古希腊和罗马人将艺术和科学提高到一个完善的境地。一百年来,众多的翻译家将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创造的财富传到了法国。阿米欧“被众人认为是法国所拥有的最优秀、最明智的翻译家”,这不仅仅是就他所选择翻译的作家而言,而且也在于他的译作的质量。可以说,阿米欧是帮助法语走出“粗俗”状态的有功之臣。然而,梅齐利亚克认为,“语言之美不足以构成一部优秀的译作。没有人不承认,一个好的翻译家应具备的最为关键的品质,是忠实”。在阿米欧翻译的《名人传》里,他发现“在两千多个段落中,原作者的意思不仅没有得到忠实的传达,相反,还被整个地曲解了”(Ballard, 1995, 164)。在演讲中,梅齐利亚克明确阐述道,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贬低阿米欧,而是为了让真理大白于天下,最终的目的是要“明确一个好的翻译家应负的责任”,他还明确提出了三条原则:翻译要忠实,不得给原作家增添任何东西,不得删却任何东西,也不得有可能歪曲原意的任何改动。就这样,梅齐利亚克以理性的方法,以“忠实”为标准,以不曲解原文为基本要求,对原文进行系统的分析,并从具体实例入手,寻找“错译”、“误译”的原因,并随之提出自己的翻译主张,从方法上来说,可以算是法国翻译批评的最早、最具系统性的一次实践了。

而近几十年以来,翻译理论的研究借助现代哲学、语言学及文艺理论等领域的最新成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而在翻译批评的实践上,我们所谓科学意义的批评也已经初显端倪了。

首先可举的是特拉维夫学派的社会语言学途径。由埃文-祖海尔(Even-Zohar)首创,图里(Gideon Toury)及布里塞(Annie Brisset)等人发扬光大的特拉维夫学派从目的语入手,将文学翻译放在“翻译文学”的层面上来考察。对于他们来说,翻译文学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中“多元文学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因此研究翻译不是研究两种语言的转换机制,语言学家或哲学家更不具有任何优先权。在研究翻译时首先要做的,是研究“翻译文学”所赖以生存的目的语语言文化、社会历史条件及至思想观念。具体到翻译批评的体系,图

里进一步提出了“准则”的观念。他认为如同任何一种行为活动,翻译必然受到一系列类型各异、程度不同的“限制”,而准则则主要表现为由某一社会共同体所普遍承认的价值观:选择什么样的作品进行、翻译最终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和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合理程度,都是这类准则作用的结果。为了避免社会决定论的倾向,布里塞则将“翻译文学”放置在“话语”这个更大的背景中,他认为对翻译的研究就是考察“原语文本所携带的‘话语’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以怎样的方式进入接受语社会的‘话语’环境”的(Brisset, 1990, 25)。于是在这个基础上,特拉维夫学派的翻译批评显然必须以目的语的历史性语言文化宽容度为衡量得失的标准。

与此相反,法国当代文论家、翻译理论家及批评家亨利·梅肖尼克(Meschonick, 1973)的“介入”批评偏重的却是原文本。因此他的批评也是“摧毁性”的,对与其观点不符的译本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在对奥地利籍的罗马尼亚诗人瑟朗(Celan)的法译本进行批评时,他指出译本的失败源于“思想、审美、文学观念与传统上的偏见”,是“翻译心理的主观缺陷所致”。他还指出,与我们平日所想的恰恰相反,译者经常在翻译中表现出一种自命不凡、漫不经心、起伏无定甚至自我取悦的倾向,以平衡补偿自己的“被弃感”和“孤独感”。这时,无论“忠实”还是“自由”都成了一种名义,译者只是借助这样的幌子来自欺欺人。毫无疑问,梅肖尼克是有其自身的理论基础的,具体地说,就是他借助现代语言学、符号学及诗学成果所创立的“关于创作”的翻译理论。他的理论明确而独特,他的批评模式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完全自治的系统,实质上仍然从属于他的诗学理论。也正是这种创作至上的标准使他的翻译批评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理所当然地倾向于维护纯粹的“原创作”;另一方面,他又不可能不宣扬唯有将译本提高到创作的角度方可与原作等量齐观。梅肖尼克在这个自设的矛盾中采取了论战的态度,将大多数译作拒之门外,从而被大多数译家拒之门外。

于是在特拉维夫学派的实用批评与梅肖尼克的介入批评之间,出现了安托瓦纳·贝尔曼的“大写批评”。这位英年早逝的批评家在其生命之终写下《翻译批评论:约翰·唐》一书,从自己数十年的翻译批评实践出发,以现代阐释学为理论根基,勾勒了从事翻译批评工作的大致“草案”,并以对英国神秘主义诗人约翰·唐的 *Going to bed* 一诗的法译批评作为具体实证,意欲通过这本书使长期处在自发与混乱状态的翻译批评得以理论化。在贝尔曼看来,翻译是基于前理解,且等待着后理解的理解循环中的一站,本身就是批评的一种形成,因而翻译批评首先是“批评的批评”。“建构性”与“自治性”正是这种

“大写的批评”的两大特征。从理论上来说,翻译批评的模式应当是“自省的,能以其自身特点为批评主体的,能产生自身的方法论的评论方式”。而从实践角度而言,贝尔曼则以翻译主体为整个理论的支点,强调在批评中要确立译者的翻译立场,找寻译者的翻译方案,考察译者的翻译视界,通过对原文及译文的阅读与比照进行批评。他认为翻译批评应当持道德与诗学的“双重”标准,亦即一方面要尊重原作,对原作负责;另一方面译作应当作为整体存在,有一定的节奏,有连贯的风格,有内在的统一,总之是一部真正的用目的语进行创作的作品。

转过头来分析中国的文学翻译批评,建国以来,似乎出现过两个高潮。第一个是在50年代初期,不少译家和理论家在《翻译通报》上撰写了一系列争鸣文章,就翻译批评的标准与原则展开了探讨。很显然,正如董秋斯(1984)所提出的那样,当时的翻译批评苦于缺少一个较为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因而尚不能够形成一个所谓公认的客观标准。但是“怎样进行批评”终究是可以讨论的。为此,焦菊隐(1984)倡导“给翻译批评指出一个原则性的方向”,而不要“主观地订立一个衡之事实过高或过低的标准”,“归纳出一个切乎现阶段实际情况的标准,本扩大翻译工作影响的目的,作为从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翻译界现阶段水平的指南”。他还从“人力”、“语言”与“影响”三个方面指出了翻译批评所必须考虑的客观条件,尤其是在“影响”这一条里,焦菊隐谈到“倘若一种译文,在人民的思想知识上,起了一定的提高作用,虽然它里边有若干可以商讨的地方,也该表扬重于批判。不去重视影响的问题,而只枝枝节节地评论某一句某一字,那是‘舍本求末’;不但如此,这种批评文字,也会无意识地妨碍了新中国文化的发展”(1984:39)一可算是较为朴素地提出了批评的“肯定性”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从文化建设的角度看待翻译。此外,讨论中大家都谈到不同的文本类型应该有不同的批评标准,批评态度也应该是“善意的”,“良好的”,“恳切的”。

但是翻译理论以及批评理论的不够完善,加之“国外的某些理论,标准太高,又不能完全适用于今日我国翻译界普遍的情况”,使得这场讨论最终依然没有对翻译实践起到决定性的影响。相比较而言,90年代再次兴起并一直持续至今的第二次翻译批评高潮则显得更为系统,也更能触及批评的实质问题。在《也谈文学翻译批评》一文里,李文俊(1994)明确指出,批评名家名译是可以的,关键是看批评的方式。而文楚安则从翻译主体着手,强调译者是原作的读者/研究者和译作的作者/作家这样一个双重的身份,唤请翻译批评不能局限于文本,而更要注意“翻译家自身的个性、休养、品格”,要“令人信服

地回答翻译的本质——即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是艺术,而且归根结底是一种有别于创作,但又与创作相似,艰苦而特殊的体力和心智劳动”(文楚安,1994,771-772)。1992年,国内第一本文学翻译批评的理论著作《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出版,书中就文学翻译批评的原则、方法做了较详尽的阐述,并以《追忆似水年华》一书的翻译为理论部分的实证,涉及到了文学翻译中许多基本问题。而1995年开始的《红与黑》汉译讨论以及《尤利西斯》的“名家名译”讨论似乎可以看作是命运送给翻译批评,尤其是文学翻译批评的大好契机。前者以《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一书的结集出版而暂告落幕,在讨论中,译家、理论家、批评家包括读者在内都充分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就“忠实”与“再创造”、“异国情调与规划”、“作者风格与译者风格”、“人地名的翻译”、“文学翻译的受制因素”以及“文学翻译的文化大背景”等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阐述,进而也澄清了文学翻译当中许多由来已久的悖论,可以说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在理论指导之下,关于文学翻译批评的系统讨论。《尤利西斯》两个几乎同时推出的名家译本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争论告诉了我们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对名著进行阐释的多种可能会导致翻译的多种可能——文学翻译批评的目的因而决不是“肯定”当中的一种,恰恰相反,它应当为所有的可能性奠定基础。

3. 翻译批评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批评在理论探索上也取得了令人欣悦的进步。但是诚如我们在文章伊始所指出的那样,翻译批评自发以及混乱的状态依然存在,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扭转。究其根本,我们认为,一方面,这是理论与实践之间一定的距离造成的;但是更重要的一方面,还是应当归咎于时下的翻译批评对自身的地位、任务、方式、功能没有一个清醒而系统的认识。因此,致力于翻译批评研究的同行也许必须首先着眼于探讨解决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1) 科学的批评精神

翻译批评究竟是什么?它应当怎样确立它的客体——翻译的地位?进而又怎样确立自己的地位?实践中的翻译归根到底是以理解为前提的一种创造行为:就理解而言,它是要消除差异;而就创造而言,它却是要表现这个世界的差异与多元。它远远不是一种终止性的结果,它的创造必将它的理解结果一道并列成为理解循环下一站的起点。翻译批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译作的“后理解”的,它不仅要理解翻译中的“理解”,还要理解,并且评价翻译中的“创造”。没有这样的认识,翻译批评便会流入“先决的否定”,在批评之

前就已经判定译作“低”于原作,进而满足于指责译作因为种种的“不等值”造成的“错误”。更糟糕的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翻译批评本身也无法确立自己的地位,它只能成为一种附庸,附庸在翻译实践或翻译理论上:它无法产生自己的方法论,自己的理论体系,无法面对自己的理论客体,无法完成自己在整个文化背景中的功能。科学的批评精神意味着翻译批评第一不能把原文本(甚至原语言)当做批评的归宿与标准;第二不能赋予自己指点江山的权力;第三不能满足于现在这种自发及随意的状况,不能满足于语言层次的正误评判。

(2) 自主的批评理论体系

正如贝尔曼所指出的,翻译批评“不仅要产生出自身的方法论,而且还试图将该方法建立在明晰的,有关语言、文本及翻译的理论基础之上”(Berman, 1995:45)。

由于翻译批评并不“附属”于翻译或翻译理论,所以科学的翻译批评首先要解决的应该是自己的理论体系。它不是要回答翻译中的基本问题,也不是要否定旧译,更非提出批评家自己的具体解决方案。它面对的将是一个系统,该系统以翻译过程、译作及译者为考察对象,阐述的是译者与原作、与其译作之间,以及译作与它的读者、与目的语语言文化之间已产生的或将产生的关系。

但自主并不代表惟一。和翻译理论有着诸多研究途径同理,翻译批评的理论体系也有多种可能。只要它从批评实践中产生,并且能够反过来观照翻译理论,就不失为一种成功的理论探索。

(3) 规范性的批评标准

相对于自身所确立的体系来说,标准仍然只应当是规范的,严谨的。当然,这种标准不是语言上“是”与“非”的标准。基本上它可以理解为与理论体系相一致的原则与方法。翻译批评的过程其实逃不脱这样一个顺序:首先是对原文本与译作的阅读;其次是对于翻译主体的确定,即译者处在怎样一种工作环境中(这个环境既包括译者的私人环境,也包括目的语历史提供给译者的语言文化环境);再者是原文本与译作的比较(需要注意的是,比较不是批评的目的,批评的目的在于比较之后的原因的分析与揭示);最后则是依据自己理论体系所做出的价值性的评价(不是评判)。批评的关键在于怎样运用这个程序,并且根据批评目的的不同而做出不同的偏重。不少译家所向往的一个“公认的客观标准”,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可能完全成立的,但是随着翻译理论的基本问题进一步获得澄清之后(这本身就需要翻译批评的推动),在

一定的历史时期,就某一个具体问题,一个为大多数译家所接受的、能动的价值取向却可望达到相对的统一。

(4)开放的批评视野与指导性的批评功能

有了科学的批评精神与自主的理论体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明白翻译批评所承担的责任与使命。我们说过,批评不能以否定前译为根本宗旨。前译的不足之处(不仅仅是语言方面的),甚至不成功之处,自然属于翻译批评的范畴,但决不是翻译批评的归宿。不仅如此,翻译批评甚至不是提供唯一解决方案:那是译家,而不是批评家的任务。

我们应当意识到,前译的成功与不成功从来都是历史的,而在某个历史时期的不成功也并不意味着它在整个历史上都会遭摒弃,反之亦然——批评要澄清这段历史,这就是它的首要责任。

我们更应当意识到,作为翻译批评,它的本质是“建构性”的(这里我们借用贝尔曼的词汇)。也就是说,如果前译成功,它要依据自己的理论基础指出成功的根本原因,并指出在或然的历史条件下别的可能;而如果前译是不成功的(自发的批评往往集中在不成功的译作上),那么批评的功能就在于指出它与翻译历史、与语言文化历史不相符的地方,并且开启复译的空间,为等待成功的复译的到来做好理论上的准备。

这才是翻译批评的真正必要所在。

参考书目

- Ballard, Michel. (1995). *De Cicéron à Benjamin*. Lil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lle.
- Berman, Antoine. (1995). *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 John Donne*. Paris: Gallimard.
- Brisset, Annie. (1990). *Sociocritique de la traduction*. Quebec: Editions du Préambule.
- 董秋斯(1984). 翻译批评的标准和重点. 翻译通讯. 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页 25-29).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焦菊隐(1984). 论翻译批评.《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页 35~43).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金圣华(1995). 文学翻译的创造空间. 翻译季刊, 2: 66-76.
- 李文俊(1994). 也谈文学翻译批评. 杜承南、文军主编,《中国当代翻译百论》(页 764~767).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 Meschonnic, Henri. (1973). *Pour la poétique II*. Paris: Gallimard.
- 文楚安(1994). 一种翻译批评观:论文学作品的合格译者. 杜承南、文军主编,《中国当代翻译百论》(页 768-773).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 许钧(1992). 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南京:译林出版社